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云林石谱

外七种

〔宋〕杜绾等著

王云 朱学博 廖莲婷 整理校点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云林石谱

外七种

〔宋〕杜绾等著

王云 朱学博 廖莲婷 整理校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林石谱：外七种 / (宋)杜绾等著；王云，朱学博，廖莲婷整理校点.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7

(宋元谱录丛编 / 顾宏义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1093 - 6

I. ①云… II. ①杜… ②王… ③朱… ④廖… III. ①岩石—基本知识 IV. ①P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178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云林石谱(外七种)

[宋]杜绾 等著

王云、朱学博、廖莲婷 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80,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093 - 6/P · 3

定 价 18.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至唐代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道《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度繁荣密切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

中游重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编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鸞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

于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撰有《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考，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动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 ）”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对石头的记载在宋代以前的典籍中早已有之，《山海经》中便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玉石以及其他石种的描述。比如《西山经》中载：“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隼山，是簞于西海，无草木，多玉。淒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黄金，多丹粟。”古时自天子至士大夫皆有佩玉的礼俗，祭祀也对玉石多有需求，像《山海经》中这样对于石料的记载与石料本身的社会功用有着莫大的联系，几乎不涉及私人感情。直至唐以前，即使是在抒情言志的诗歌之中，对石头的描写也往往只是客观的摹画，或者仅仅把石作为一种早已存在的象征性的意象出现，很难看到作者把自己对石的赏玩和喜爱之情吐露在作品中。

赏石玩石在唐以前文字记载中的不常见，一方面由于文献流传不足，现在看不到更多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资料；另一方面便是缘于士大夫们对《尚书》经文中早已告诫的“玩物丧志”所持的谨慎态度。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曾记载了祖约好财和阮孚好屐的轶事，虽然入在《雅量》题下，对于这种近乎痴迷的个人爱好，作者刘义庆在行文时还要用“同是一累”来形容它。

唐代以后，随着士人审美意识的自觉化和日常化，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到了“与士大夫治天下”、“以文为

贵”的宋代，尚雅的情趣与日趋精致的生活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斗茶、赏花、造园、玩石、博古都在此时为盛，相关的记载和专书便逐渐增多，各类谱录的撰写也开始流行，石谱类著作便在赏石玩石风气的熏沐下应运而生。从石谱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石料的种类、用途、形状、颜色以及品评标准，还可以从文中记载的人物故事里品味那个时期人与奇石间的趣事与纠葛。

—

流传于后世的宋代石谱有《云林石谱》、《宣和石谱》、《太湖石志》三种，其中以《云林石谱》所载诸石最为全备，它也是中国第一部石谱类专著，关于创作者的初衷，孔传在为其所作的序中写道：

圣人尝曰仁者乐山，好石乃乐山之意。盖所谓静而寿者，有得于此。窃尝谓：陆羽之于茶，杜康之于酒，戴凯之于竹，苏太古之于文房四宝，欧阳永叔之于牡丹，蔡君谟之于荔枝，亦皆有谱，惟石独无，为可恨也。云林居士杜季阳，盖尝采其瑰异，第其流品，载都邑之所出，而润燥者有别，秀质者有辨，书于简编，其谱宜可传也。且曰：“幅员之至远，闻见或遗，山经地志，未能淹该编览，尚俟访求，当附益之。”

《云林石谱》的作者杜绶是北宋大臣杜衍之孙，生活于两宋间，生卒年不详。他的父亲曾经赠送给苏轼一端巩石斫制的大圆砚，被称为“天波”。杜绶的青壮年甚至更多的时期应是处在北宋时。《云林石谱》大约成书于宋室南渡不久的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前后，全书列及石头名称110余种，并对其产地、采取方法、形状、颜色、质地、声音、硬度、纹理、光泽、用途等方面作了详细的描述，种类涉及钟乳石、化石、玉石、玛瑙石、翡翠、金属矿石等等，产地范围遍及宋室南渡前的南北各州县。可以想见，其中的很多材料在宋南渡前便已经搜集，而这样完备的论石专著产生正是经历了宋代艺术和赏石文化的巅峰时期——北宋徽宗朝。

被后世评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宋徽宗赵佶（1100—1126在位）精于书法、绘画，于声律、词赋无不通晓。他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极大地鼓励和促进了当时艺术和文化的发展。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开始在汴京兴建著名皇家园林艮岳，又称华阳宫。以国家之力广搜全国奇花异石，置之其中，并为此设立了苏杭应奉局，专事在东南江浙一带搜罗花石，用大船运向汴京，负责运输的船队被称为“花石纲”。《宋史》载艮岳：

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有书

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嵒、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嘒嘒亭，北直绛霄楼。山之西有药寮，有西庄，有巢云亭，有白龙洲、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半岭有楼曰倚翠，上下设两关，关下有平地，凿大方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雪浪。西流为凤池，东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东池后有挥雪厅。复由嵒道上至介亭，亭左复有亭曰极目、萧森，右复有亭曰丽云、半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间。西行为漱琼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观、圉山亭，下视江际，见高阳酒肆及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支流别为山庄，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穷极巧妙。而景龙江外，则诸馆舍尤精。其北又因瑶华宫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壶，东尽封丘门而止。其西则自天波门桥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过阊阖门，为复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属之龙德宫。

其规模宏大、穷极巧妙之处可见一斑。又载为了营建艮岳，“自政和讫靖康，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而长

时期的横征暴敛使得民怨渐起，天下萧然。随后金兵入汴，艮岳盛景也随着北宋的倾亡成为废墟。元代诗人郝经在路过河南开封的故宋宫苑时曾咏道：“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龙德故宫怀古》其七）诗中所说的致使亡国的万岁山便是艮岳。《说郛》中有题为蜀僧祖秀作的《宣和石谱》，便记录了艮岳各个奇峰的名称。

与《云林石谱》和《宣和石谱》不同，范成大《太湖石志》专述太湖一带的石产和石峰。此书的全貌现在已经不能看到，今传者为自《说郛》中辑录。

入元以后，士人对于奇石的喜好并没有消退。现在能看到的元代石谱也是从《说郛》中辑录而出，名为《渔阳公石谱》，也称《渔阳石谱》，篇幅不大，记载了撰写者所见过的奇石以及由唐至宋名石与名人的故事。

二

宋元石谱中记录的名石从用途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也是最主要的一类，为园林观赏石。可单独摆放，也可叠做假山，主要置于园林中，其小者则置于几案。其特点最重婉转通透，又重自然成峰峦或成物象，从历史渊源看，这类园林观赏石以太湖石最为著名。《渔阳公石谱》言米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语焉：曰秀，曰瘦，曰皱，曰透。四者虽不尽石之美，亦庶几云”，太湖石便常常兼有此四美。

对太湖石的重视和喜爱早在唐代便已经形成风气。白居易《太湖石》诗谓：

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嵌崟。才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嵌空华阳洞，重叠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剑门深。形质冠今古，气色通晴阴。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沈沈。天姿信为异，时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

又有诗谓“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断碧云根。风气通岩穴，苔文护洞门。三峰具体小，应是华山孙”。足见他对于太湖石的称赏。他所作《太湖石记》中记载了当时的丞相牛僧孺对于太湖石的嗜好，“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为之分列品级：

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

太湖石被士人热爱与当时私人园林的兴盛不无关系。《云林石谱》称太湖石“最高有三五丈，低不踰十数尺，间有尺余。惟宜植立轩檻，装治假山，或罗列园林广树中，颇多伟观，